

田智忠 著

朱子论 『曾点气象』研究

儒道释
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田智忠 著

朱子论
『曾点气象』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田智忠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11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978-7-80752-055-9

I. 朱... II. 田... III. 朱熹 (1130~12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244.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970 号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田智忠 著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3.5
字 数	3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055-9
定 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田智忠，1971年生，河北宣化人，哲学硕士、博士。1993年入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学习，2000年考入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师从商聚德、韩进军老师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学校优秀硕士论文奖，并于同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李景林教授，200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朱子学。先后在《孔子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

内容简介

朱熹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的重点，“曾点气象”则是理学中的重要话题。本书从朱熹关于“曾点气象”话题的讨论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的有无虚实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辨等关键问题，旁及历史上相关“曾点气象”的评论，进而引出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本体与功夫的讨论，以小见大、以一贯多，在诸多方面填补了以往朱子研究的空白。本书充满创新精神，将“曾点气象”的研究范围从《论语集注》扩展到朱子全部文本做全面分析，有《论语集注》稿本的发展及相关书信的考辨对朱子的观点做历史性的分析，都体现了作者的创新意识。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汤伟侠（执行） 卿希泰（执行） 罗中枢

副主编：唐大潮 李 刚 潘显一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尤汉基	邓锦雄	汤伟奇	汤伟侠
余孝恒	吴景星	李 刚	陈 兵
陈国超	张泽洪	罗中枢	周田青
赵志鋈	赵耀年	段玉明	段志洪
钦伟刚	骆晓平	卿希泰	唐大潮
翁永汉	郭 武	黄小石	梁赞荣
潘显一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由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国家“985”二期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

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编委会主编 卿希泰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新的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

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2005年8月5日于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
研究创新基地、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序

今年5—6月间，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一个名为《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话：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大陆和台港儒学研究学者不少，但对儒学的现状和前景，却弥漫着一种缺乏底气的、悲观的情绪。以致有基督教学者公开提出质疑：你们所谓儒学，观点论域不一，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观念和价值系统；现在讲对话，我们实不知与谁（?!）来对话。这个质疑，虽嫌尖刻，却颇切中要害。但据我个人近年来对儒学发展状况的观察，觉得对儒学的未来，应持一种适度乐观的态度。我在大会的闭幕会上就此作了一点回应：主要是提请大家注意近四至五年来大陆儒学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并对之加以反思。

的确，现代以来，由于太过长期的“革命”、充斥整个社会的反传统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生活样式的历史连续性发生断裂，儒学既失其制度性依托，亦逐渐失去了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学术层面上，现代的儒学研究乃退居学院化一端，被纳入现代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思想框架。这样，作为中国文化学

术之整合基础和人伦教化之超越性本原的传统儒学，乃转而成为现代学术分科中之一“科”，成为一种无关乎社会生活的“理论”和析出于历史连续性之外的“知识”，使之难以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一个活的文化生命动力。儒学似乎失去了它在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所。有学者把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存在状况形象地比喻为博物馆之陈列品^①或无体之“游魂”^②，这似乎并不为过。

但是，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几年，中国大陆儒学的状况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民间儒学、学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各地种种民间性的儒学和学术组织，如书院、精舍、学堂、学塾、学会、讲堂等纷纷恢复或建立；各类民间性学术文化活动，诸如读经、会讲、讲学、读书会、沙龙、法会等，亦日趋活跃，中国的民间儒学和学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已渐有复兴和蔚成风气之趋势。从更深一层来看，这种状况乃表现了一种民众文化意识的转变和觉醒。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反传统意义上的“热”，就连一般具有自由意识的知识精英，也难以摆脱当时政治现实和流行思潮的束缚，而将中国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儒学和历史传统。九十年代的儒学热，其实亦只是少数学院知识分子所关注和讨论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以来的儒学和文化热，却不仅限于学院学者和学术研究，同时亦根于民

① 这是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对儒学在现代中国状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学已成“博物馆”中的存在，正因为它已退出了历史，不足以影响现实生活，因而才得以被“收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第二部分和“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游魂”说是余英时先生关于现代儒学的困境的一个形象说法。参阅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收入其所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间，逐渐深入民众意识。这两年，大陆出现了一些在大众中受到普遍认可，具有轰动性效应的“学术明星”。近所谓“于丹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明星”，在这个意义上，“明星”乃标志一个时代的价值和精神企向。战争年代的明星是“英雄”，“文革”时代的明星是“造反派”。在我们这个穷奢极欲和消费至上的时代，为大众所广泛认可的儒学和学术明星的出现，正表现了社会民众之儒学和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

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其意义并不限于一般民众生活，它也在推动着学院儒学的转变。民间的儒学和学术，其特点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讲学、自由的思考，总之，体现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因其起于民间，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故更具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学院儒学和学术，亦可以说已经开始逐渐民间化并已具有了相当的民间性。学院儒学和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其诠释的原则，已经由一元趋于多元。这为学者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条件，使其研究工作可以与自己的志趣乃至其价值的认同逐渐达致合一。知行合一，本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根本精神。在这种情势下，学者已逐渐有可能秉承传统“为己之学”之宗旨，无所依傍，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这使学院的儒学和学术渐具教化之功能，亦具有了切合于一般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考虑到大学招生的历年扩大，现在，约近半数的青年人要从各类高校毕业走向社会，学院儒学的教化作用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譬喻，这是否意味着，儒学可能有机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借尸还魂”，而不再做无体之“游魂”了呢？

对中国当前儒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我的评估是：有喜有忧，而喜大于忧。

《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从历史来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的教化理念，既植根于社会人伦和民众日常生活，又能以其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对之加以诠释、点化和提升，二者之间，总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动张力关系。这是儒学能够持续地保有其活的文化灵魂和生命原创力的原因所在。因此，重建儒学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内在联系，乃是儒学未来获得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近年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以及民众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已逐步为此建立起一个现实的基础。此吾人所可以为之“喜”者。

“历史性”与“当代性”，乃是文化自身之共属一体的两个方面。由乎其历史性，文化乃保有其民族的个性和其原创性的动力；由乎其当代性的建构，文化乃具有其当下生命的活力和因应现实及其持续展开的普世性价值。就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而言，不同时代各有自己时代的儒学。这本身就显示了文化之历史性与其当代性的统一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儒学之所以能够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而具有普世性的教化作用，这是其根本所在，而不仅仅因儒学的政治制度化使然。学者已普遍意识到，在现代的儒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理论诠释原则（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理论原则）与历史传统相互外在的状况，这不仅已经导致了现代儒学研究之“历史性”的缺失，同时亦使我们未能真正建立起当代形态的儒学系统。由于缺乏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我国民间儒学和学术长期付诸阙如。近年来，民间儒学和学术迅速兴起，面对这种情势，我们却突然发现我们的研究与之

相距甚远，难以切合和因应。在我们为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感到鼓舞的同时，也应看到，时下民间传统也表现出一种沉沦和堕落的趋向，如民间宗教常常流于荒诞迷信和巫蛊小道，传统宗族亲亲关系在很多地方衍生为族长专制势力等等。中国传统儒学对包括祭祀、卜筮、神灵崇拜等民间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以“察乎天地”的“君子之文”，对百姓生活之“神”加以澄汰、点化和提升，而赋予其超越性的精神意义^①。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般社会民众生活和民间宗教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迷信巫化的倾向，需要有合宜的礼仪礼俗形式，以及与之相切合的形上理念系统对之加以教化和提升，方不至趋于腐化和巫蛊化，由之保持其健康的发展。未能建立起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切合的、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教化理念和价值系统，这是目前社会生活趋于沉沦和堕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吾人所当以为“忧”者。

因此，逐步建构起能够与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相切合的儒学现代形态，应是当前儒学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且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精神层面而言，当前学院的儒学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民间性”，这是其能够再度获致其生命原创力的一个前提。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民间性”，是指它摆脱外在的意识形态束缚，而真正表现出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自由讲学这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真正属于社会，关乎世道人心而言，

^① 《易·观·彖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荀子·天论》：“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神道设教”，是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因任；但因任非放任，故须导之以“君子之文”，以使其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对社会民众生活行其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并非要从现实上使之成为民间的书院。从现实层面而言，学院的儒学研究与民间的儒学和学术仍是有区别的。在现代分工的条件下，学院儒学在学术力量和资源的掌握上无疑都处于主导和优势的地位。因此，学院儒学理应成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当代形态理论建构的核心力量，学院儒学应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学院儒学要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和使命，就需要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简单说来，现代儒学研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切合民众生活和世道人心，乃由于其“历史性”的缺失；这“历史性”的缺失，则由于儒学本体的未能重建和挺立。

就应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而言，现代儒学所面临的处境颇与宋明儒相似。毫无疑问，宋明儒学受到佛学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是儒学作为心性义理之学之形上本体的重建，而非一些学者所谓的“阳儒阴释”。宋明儒学虽以心性义理之学的建构为要务，然其学说的根本，实在于世道人心之教化与人伦秩序之安顿，而非专主于空谈性命。宋儒秉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①的信念，坚信儒学的外王和教化，不能建基于释老的性命之理。故其心性义理之学，乃旨在应对释老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的冲击，以重建圣学教化和外王事业之形上学的基
础。余英时先生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对此已有充分的说明^②。自上世纪初叶起，儒学既面临学术现代转型的问题，其社会生活的基础亦逐渐遭致削弱。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标志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初步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

① 《周易程氏传序》，《二程集》，第6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参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篇第八章第一、二节，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此一转型，实势所必然。它对于实现儒学及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哲学、学术思想在现代学术层面上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讲，这一转型，并未实现建基于儒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新的诠释原则的生成及其文化主体性的现代重构，而是据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对之作外在的规划。就儒学而言，这一转型，实质上已使其性质发生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阳儒阴西”的嬗变。这与宋明儒学所受佛学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标志着社会精神生活之历史记忆和文化主体意识的逐渐复苏，同时也愈益凸显出这种“阳儒阴西”型儒学对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的不相干性。

从历史上看，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巨擘——孔子、孟子、董子、朱子等，其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乃皆经数百年之文化积累孕育而成者。现代形态的儒学建构，亦需要长时期的人文积累和孕育。而长期以来理论诠释原则与历史传统的相互外在，造成了我们的儒学研究在思想学术上人文积累的缺失和思想原创力的不足。近年来，与民间儒学和学术的渐趋活跃相呼应，学院儒学也在悄然发生着一种学术上的转向。儒学学者民族和文化关怀的意识增强，儒学哲理系统所蕴涵的教化或宗教性义涵受到关注。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青年儒学学者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这一代学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国力渐强和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因而具有对历史传统强烈的认同感，思想上较少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学术训练系统，外语功底扎实，对中西学术能够融会贯通。他们的研究较之前一代学者，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历史眼光和创造精神。他们的加入，已逐渐使儒学的研究由单向度的西方哲学和思想学术标准

转向对儒学自身学术思想独特性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揭示。这对于儒学现代形态的重建所需的人文积累和孕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我的观察，近年青年学者的儒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诠释视角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注重概念范畴的分类辨析转向由问题的考察切入儒学的历史传统。此点看似简单，但关系重大。概念范畴的分类辨析，是注重在外部对儒学做抽离于其历史和精神传统的理论分析，而问题的考察则着眼于揭示问题在原有历史序列中的意义，其方式表现为回归儒学大传统之整体性的意义重构。我们手头这部田智忠博士所著《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就是在这个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一部儒学研究著作。

一个时代的思想建构，首先表现为一些核心话题的孕育和凝炼。“曾点气象”之形成为宋代儒学的流行话语之一，亦有着某种历史和思想的必然性。宋明儒有关“曾点气象”的讨论和思想的历史性展开，其中各种复杂观点的交错与交锋，徘徊于所谓“敬畏与洒落”之两极互通的张力关系中。这表现出宋儒凸显道德心性和超越境界而又拒斥佛老，以达儒学心性本体和形上学重建的精神追求。朱子的“曾点气象论”，既有对曾点得见天理流行之悠然“胸次”的褒扬，亦有对片面强调和乐而易流于释老蹈空蹈虚之弊的警觉与排拒，在其一身之中，已表现出上述思想的复杂性，而这同时也折射出有宋一代儒学应对释老，实现其“当代性”重建的时代课题。因此，“曾点气象论”，看似一小问题，但却具有贯穿、透视并切中整个时代精神，并由此上接儒学大传统的重要意义。本书通过对朱子“曾点气象”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曾点气象”成为理学流行话语的思想与历